

江苏省一级期刊

ISSN 1671-1165

CN 32-1607/C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人文社会科学版

自然审美批评的观念与知识基础

薛富兴

污染流向何处——美国环境正义问题中的种族和阶层因素

□

协办单位：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

2018 第1期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
(总第69期)

第四届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蒋建清

副 主 任:

王培君(常务) 李维林

张晓琴 叶 平 卢 风

王国聘 王全权 曹顺仙

高晓琴 朱 凯

【环境伦理学研究】

弱势生态资源的保护路径探析

——以湛江红树林的保护为例 罗贵榕(1)

西方绿色思潮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及其生态启示 ... 林丽婷(7)

莫马迪小说中的动物伦理观 李鲜花(16)

环境与命运:当代意义死亡伦理结合环境伦理的战略智慧

..... 姚站军(24)

【环境美学研究】

自然审美批评的观念与知识基础 薛富兴(35)

阿诺德·柏林特的环境美学共同体 廖建荣(50)

【环境政治研究】

污染流向何处?

——美国环境正义问题中的种族和阶层因素 58)

中世纪德国环境灾害问题研究 江山,胡爱国(74)

社会批判理论对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启示

..... 延明,苏百义(85)

【环境法与教育研究】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法经济学分析

——基于2005—2017年120份环境侵权判决书

..... 徐静文,张红霄,何文剑(93)

环境教育的缘起、内涵及实践性 郭紫薇,郭辉(105)

【综合述评】

新世纪生态文学研究趋势与理论反思

——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工作坊”第二期综述

..... 韩启群,陈洁(112)

[期刊基本参数] CN 32-1607/C*2001*q*A4*116*zh*P* \$15.00*1000*11*2018-03

本期英文审校:喻惠群

3月31日出版

本期执行编辑:张月红

Contents

On Protection Approaches of Disadvantaged Ecological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Mangrove Protection in Zhanjiang Luo Guirong(1)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f Western Green Trends of Thought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Lin Liting(7)

Animal Ethic Conception in the Works of N. Scott Momaday Li Xianhua(16)

Environment and Destiny: Strategic Reflections on Combination of Contemporary Death Ethic with

Environmental Ethic Yao Zhangjun(24)

Conception and Knowledge Basis of Natural Aesthetic Criticism Xue Fuxing(35)

Arnold Berleant'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Community Liao Jianrong(50)

Where Does Pollution Go?

——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Zhao Lan(58)

A Study of German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in the Middles Ages Jiang Shan, Hu Aiguo(74)

Enlightenment of Social Critical Theory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 Yan Ming, Su Baiyi(85)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About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Causality

——Based on 120 Copies of the Judgments of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s from 2005 to 2017

..... Xu Jingwen, Zhang Hongxiao, He Wenjian(93)

Origin,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ity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Guo Ziwei, Guo Hui(105)

污染流向何处?

——美国环境正义问题中的种族和阶层因素*

摘要:环境权益的公平享有和环境负担的合理分配构成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主要诉求。围绕有毒有害废弃物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美国政府、宗教团体、学界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并形成主流观点,即种族因素在决定环境权益和环境负担的分配中起到了决定作用,环境歧视构成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一个方面。但是,通过对主要调查研究的审视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的方法与结论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脱节现象,其结论或许片面强调了种族在环境权益与环境负担分配中的作用。美国环境正义问题以种族为核心的主流分析框架也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政策制定的依据,受害群体在其法律诉讼中也多以种族歧视提出指控,但这些努力效果并不明显。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受害群体的种族属性或许并不是导致环境不正义事实的主要因素,至少不是唯一的因素。种族之外,以政治力量和社会经济地位为特征的社会阶层属性在美国社会环境不正义事实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受害群体政治力量薄弱,在国会中缺乏足够的代表,致使环境正义立法在联邦层面频频失败。同时,在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序中,该群体也表现出了政治参与能力不足、政治参与意愿不强的特征。最后,该群体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使其在保护自身环境权益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关键词:美国环境;环境正义运动;环境种族主义;环境阶级歧视;有毒有害废弃物;环境权益;环境负担

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兴盛于90年代,起因是部分社区与社会群体,尤其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针对工业发展和政府的不平等政策等导致的环境伤害而作出的自然反应。20世纪70年代,一些社区的居民发现自己的家人和邻居正在受到附近有毒废弃物的不良影响,这些废弃物包括垃圾填埋场、焚化炉、工业废气、废料甚至是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喷洒在自家社区的物质。最先是直接受害的人们,尤其是养育子的主妇,后来整个社区、社会、学术界都参与进来,迫使政府和企业都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民间、宗教及政府组织的调查发现,有毒废弃物不成比例地集中

* 收稿日期:2017-11-09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厅项目(20151001)

作者: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在少数族裔或低收入群体聚居的地方,环境种族主义、环境歧视等概念迅速进入公众视野,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环境不正义的现象,美国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种族歧视在环境领域的体现,种族与族裔之间的不平等成为美国环境正义问题的主流分析框架。但是,通过对美国主要调查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正义问题受害群体的阶层属性,也决定了他们在环境权益和环境负担的分配中处于从属地位。他们政治力量较弱,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这使得他们在代议民主制度下无处发声。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美国社会,他们的利益往往被忽略。

一、有关种族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有毒有害废弃物在少数族裔社区不成比例地集中,这一直是人们的直观印象。1982年,南卡罗莱纳州沃伦县一个黑人社区奋起反抗一个多氯联苯填埋场的修建,这标志着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爆发。在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刚刚告一段落的20世纪70年代末,该事件从一开始就将人们的注意力锁定在种族问题上,使人们自然地将环境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催生出环境种族主义的概念。随后迅速铺开的环境正义运动引起了学界、政府的关注,他们各自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验证人们的主观经验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在现有调查研究结果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与有毒有害废弃物设施的存在最相关的社会因素是种族。在大部分研究中,种族作为一个变量,指的是一个社区或一个群体中少数族裔人口所占的比例,所谓少数族裔分为非洲裔美国人(黑人)、拉美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及北美印第安人。有关环境风险所在社区社会、人口、经济因素的研究有很多,但影响最大、被引最多的是美国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和基督教联合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 UCC CRJ)所做的研究及其后续研究。

(一) 美国审计署的研究

1978年夏天,数吨重的、体积达到约3万 m^3 的被多氯联苯(PCB)污染的土壤被非法倾倒在南卡罗莱纳州长达近400 km的道路旁边。州政府为清除它们,决定在该州沃伦县建造一个填埋场。这遭到了愤怒的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居民指控州政府的决定是种族歧视的结果,因为沃伦县的居民以黑人为主。该抗议持续了4年,在此期间,当地居民发起了两次诉讼,但法院坚持认为州政府的决定中没有种族歧视的动机,而作出了有利于州政府的判决,填埋场得以修建。1982年,当装满有毒土壤的卡车驶进沃伦县时,在全国有色人种推进会的支持下,居民们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沃伦抗议。他们躺在道路中央,堵住卡车,最后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500多人被捕,其中包括一名国会议员。^①

这次抗议事件引起了国会的重视,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主席委托美国审计署

① 王小文:《美国环境正义探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对联邦环保局划分的第四区(美国东南部)内四个商业废弃物填埋场进行有关种族与垃圾填埋场的调查。美国审计署于1983年发布了研究报告《危险废弃物填埋场选址和周边社区种族及经济状况的关系》(*Siting of Hazardous Waste Landfil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Ra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①

该研究覆盖美国东南部8个州(阿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肯塔基、密西西比、北卡罗莱纳、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这8个州构成了美国联邦环保局所划分出的十个区中的第四区(region 4)。调查集中在该区域内的四个垃圾填埋场:阿拉巴马州萨姆特县的化学废料管理公司、南卡罗莱纳州切斯特县的工业化学公司、南卡罗莱纳州萨姆特县的SCA服务公司、北卡罗莱纳州沃伦县的多氯联苯填埋场。这些全都是非现场垃圾填埋场(offsite landfills)即独立于且不毗邻于任何工业设施的垃圾填埋场。报告发现:第四区的8个州中,有四个目标填埋场。在其中的三个填埋场所在的社区,黑人人口都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在所有四个社区中,至少26%的人口收入低于贫困线,这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数是黑人。黑人收入中数低于所有种族综合在一起的收入中数。该研究分别调查了填埋场所在地(A区)和有边界处于填埋场4英里范围以内的地区(B区、C区、D区等)的人口特征。四个填埋场的种族和经济状况为:

化学废料管理公司:如表1^②所示,A、B、C区的黑人人口比例和贫困线以下黑人人口占比均为绝大多数,且远远超过该填埋场所在州县的平均值。随着考察区域范围从有毒废弃物所在州、所在县到所在区不断缩小,黑人人口比例不断增加。

表1 化学废料管理公司周边社区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

位置	人口		贫困线以下人口		
	人数	黑人占比(%)	人数	贫困人口占比(%)	贫困人口中黑人占比(%)
阿拉巴马州	3 893 888	26	719 905	19	52
萨姆特县	16 908	69	5 508	33	93
A区	626	90	265	42	100
B区	1 335	84	620	46	96
密西西比州	2 520 638	35	587 217	24	65
凯姆县	10 148	54	3 757	37	80
C区	1 060	69	532	50	93

注:依据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

SCA服务公司:如表2所示,黑人人口比例除A区为38%以外,其他区黑人都占大多

① The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Siting of Hazardous Waste Landfil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the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1983, <http://archive.gao.gov/d48t13/121648.pdf>.

② 表1、表2、表3、表4均来自The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Siting of Hazardous Waste Landfil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the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1983, <http://archive.gao.gov/d48t13/121648.pdf>.

数,所有四个区中黑人占贫困线下人口为84%或更高。

表2 SCA服务公司周边社区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

位置	人口		贫困线以下人口		
	人数	黑人占比(%)	人数	贫困人口占比(%)	贫困人口中黑人占比(%)
南卡罗来那州	3 121 820	30	500 363	16	61
萨姆特县	88 243	44	20 029	23	81
A区	849	38	260	31	100
克莱尔顿县	27 464	57	7 985	29	81
B区	607	92	244	40	84
C区	484	74	167	35	96
卡尔霍恩县	12 206	55	283	22	85
D区	724	69	216	30	91

注:依据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

工业化学公司:如表3所示,A区黑人占52%,贫困人口黑人占92%。临近区域,即B区、C区、D区和E区的黑人占30%~56%,而贫困线下人口中黑人占比从24%~100%不等。

表3 工业化学公司周边社区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

位置	人口		贫困线以下人口		
	人数	黑人占比(%)	人数	贫困人口占比(%)	贫困人口中黑人占比(%)
南卡罗来那州	3 121 820	30	500 363	16	61
切斯特县	30 148	39	4840	16	70
A区	728	52	188	26	92
B区	922	30	35	4	100
约克县	106 720	22	11 407	11	50
C区	420	41	35	8	无相关信息
兰卡斯特县	53 361	24	5 930	11	49
D区	923	56	148	16	79
E区	1 125	30	136	12	24

注:依据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

沃伦县PCB填埋场:如表4所示,填埋场所在区和5个临近区域中的3个,其黑人比例和黑人占贫困人口的比例都是大多数。其他两个临近区域的黑人比例虽然没有过半,但其中一个(菲星镇)中,除占比44%的黑人外,还有占比47%的美洲印第安人。

可见,第四区的四个垃圾填埋场中,三个填埋场所在的社区,黑人人口都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在所有四个社区中,至少26%的人口收入低于贫困线,这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数是黑人。黑人收入中数低于所有种族综合在一起的收入中数。沃伦县的PCB填埋场于1979

年获得了联邦环保局的批准,由于两次社区居民发起的抗议诉讼,填埋场的建设延迟了3年,但是两次诉讼结果都是州胜诉。也就是说,抗议只是将填埋场的建设推迟了,并未真正阻止。第三次抗议即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沃伦抗议,于1982年填埋场建设开工时,由全国有色人种推进会介入,以种族歧视为缘由而发起,但最终法院认为选址过程中不存在种族歧视的意图。沃伦抗议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此拉开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帷幕。美国审计署1983年的调查报告也似乎在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初期为该运动定下了基调,即环境正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少数族裔反抗环境歧视的社会运动。

表4 沃伦县PCB填埋场周边社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

位置	人口		贫困线以下人口		
	人数	黑人占比(%)	人数	贫困人口占比(%)	贫困人口中黑人占比(%)
北卡罗来那州	5 881 766	22	839 950	14	46
沃伦县	16 232	60	4 880	30	80
肖可镇	804	66	256	32	90
桑迪溪镇	1 331	70	545	41	91
沃伦顿镇	4 596	61	1 360	30	90
菲星镇	1 285	44	425	33	39
弗克镇	556	81	179	32	81
朱迪金斯镇	850	48	259	31	无相关信息

注:依据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

(二)基督教联合教会的研究

同样受到沃伦抗议的推动,基督教联合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在著名民权运动活动家本杰明·查韦斯的带领下,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有毒废弃物分布与种族关系的调查,于1987年发布了调查报告《有毒废弃物和种族:危险废弃物所在地的种族和社会经济特点》。^①这是第一份全国范围内的有关少数族裔社区危险废弃物的相关调查。该调查将全国少数族裔分为非洲裔、西班牙语裔、亚洲裔、太平洋岛屿人和印第安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分类)。调查分两部分,一部分集中调查商业危险废弃物设施(有偿接收危险废弃物),另一部分集中调查无人管理的有毒废弃物场所,这主要指对当前或未来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已关闭或被离弃的设施。1985年联邦环保局登记在册的无人管理的有毒废弃物场所有2万个。这里所说的危险废弃物被联邦环保局定义为工业生产产生的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害的衍生品。联邦环保局规定新产生的废弃物必须由有资质的设施即TSDF设施(Treating, Storing, Disposing Facilities)管理。此类设施可以是填埋场、地表拦蓄池或焚化

①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 *A National Report on the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ies with Hazardous Waste Sites*, New York: Public Data Access, Inc, 1987.

炉。该研究的目的被明确表述为:确定美国商业有毒废弃物设施的存在和当地社区人口的种族属性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假设为:商业有毒废弃物设施的大小和周边社区居民的种族特点之间或许存在着重要的关系。

该研究的主要发现是:(1)种族(以人口中的少数族裔占比来衡量)与商业危险废弃物设施的位置最相关,该相关性适用于全国范围;(2)拥有最多危险废弃物设施的社区其种族性也最高(即人口中少数族裔占比最高),拥有两个或以上TSD,或全国5大填埋场之一的社区其少数族裔占比是无此类设施社区的少数族裔占比的三倍之多(38% vs.12%),拥有一个商业TSD的社区其少数族裔占比是无此类设施社区的两倍(24% vs.12%);(3)社会经济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种族仍然更加相关。即使将都市化和地区差异控制,该结论仍然成立;(4)全国最大的5个商业危险废弃物填埋场中的3个都在黑人或西班牙语裔社区,这3个填埋场占全国商业填埋量的40%。

根据以上发现,该报告分别从联邦、州、城市、民间组织、社区及调查研究层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相当一部分很快就得到了采纳,如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发布了12898号行政命令,要求联邦各个机构将环境正义的考量纳入所有的日常工作中;联邦环保局于1992年成立环境公平办公室,后于1994年改名为环境正义办公室,全面负责所有联邦项目、政策中环境正义目标的达成;1991年由社会各界参与的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人峰会如期召开。

20世纪80年代美国审计署和基督教联合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的研究被称为环境正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式研究。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这两项研究的结果促成了环境问题和种族问题的融合,使得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的分配染上了浓重的种族主义色彩。由于这些研究在学界受到广泛承认,并在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针对政府及其他各方的建议,因此,美国政府及受害群体在针对环境正义问题所采取的策略中,都将这些研究作为重要指导和参考。

二、对上述研究及其结论的分析

上述几项研究虽然被看做经典研究,并被作为政府决策和受害群体法律诉讼的依据,但在仔细审查之下,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和政府与社会对此类研究结论的理解呈现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

(一) 相关性与因果关系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些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有的是一种因果关系,有的不具有因果关系。如果要确定因果关系,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实验法,在实验条件下有目的地控制自变量,观察因变量的变化,从而确定因果关系。然而,很多社会研究是在自然条件下、真实情况下进行的,很难对某个自变量进行控制,这使得即便是在两个高度相关的变量之间,也难以确定因果关系。如上述研究中,种族与有毒废弃

物设施之间存在相关性,但研究人员无法有目的地将有色人种变成白人来观察有毒废弃物设施的变化,因此,种族与有毒废弃物设施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很难确定的。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即种族和有毒废弃物设施存在都是果,它们存在共同的因,例如便宜的地价或提供大量蓝领工作并产生大量废弃物的工厂的存在。

另一种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是通过逻辑分析。统计学上,要确定A与B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A和B之间是相关的;(2)A和B的相关关系并不是由第三类因素引起的;(3)A发生在前,B发生在后。例如: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之间通常具有相关性,但是并不能据此认定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之间是因果关系。必须排除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由第三个因素引起的这种可能性。如或许该科教师的讲课魅力同时导致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提高。^①因此,必须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才可以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美国审计署的研究结果是一连串的比例,即联邦环保局所划分的第四区内的四个填埋场所在社区的有色人种比例和贫困率,将这些比例与这些填埋场所在的县、州平均比例相比,可以看出填埋场所在社区的有色人种比例和贫困率都较高。基督教联合教会的研究通过分析有毒废弃物宿主社区和非宿主社区的有色人种比例及社会经济状况,发现宿主社区有色人种比例较高,贫困率较高。2007年基督教联合教会的后续研究基本沿用同样的方法,只是使用新的方法确定宿主社区,这样确定下来的宿主社区能够更好地与受害人群相匹配。该后续研究证实了1987年的研究结果,并发现使用新的方法确定宿主社区后,有毒废弃物设施分布的种族差异性更大了。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审视,可以发现,它们所揭示的是种族与有毒废弃物设施之间的相关性,即一方存在,另一方也存在,甚至一方会随着另一方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种族与有毒废弃物设施的存在之间是因果关系。首先这些研究并没有使用实验法确定因果关系,另外,它们所确立的种族与有毒废弃物设施之间的关系只是符合了上述三个条件中的第一个。至于第二个条件,即便是通过将种族和经济状况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通过控制经济状况证明种族与有毒废弃物设施之间的独立的相关性,也并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是由其他第三类因素引起的。至于第三个条件,这几项研究作为横向研究,本身就不关注种族和有毒废弃物,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关于这一点,将于下文详细论述。

基督教联合教会的研究由基督教联合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发起,隐含的假设就是种族与有毒废弃物设施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要证实两者之间的联系。该研究的主持者本杰明·查韦斯和查尔斯·李都曾为民权运动的斗士。这使得该研究从一开始便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种族面纱。尽管其研究报告用词谨慎,称“种族被发现是所有与有毒废弃物设施

^① 诸彦含:《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

存在相关的变量中最重要的”^①，“种族比其他所有因素都更准确地预测了有毒废弃物设施的存在”^②，甚至明确提醒读者“本研究并非为寻求因果关系而设计”^③，但是在研究报告的结论部分，还是出现了“决定因素(factor)”这样的字眼，“种族是美国商业有毒废弃物设施是否存在的一个决定因素”^④。可见，1987年的《有毒废弃物与种族》揭示了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但是似乎研究者本人也将之误解为因果关系了。

该研究报告提出的建议分五个部分，分别对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教会等社区组织、其他如企业、学术机构等提出政策及行动建议。这些建议共有25条，其中22条使用了“种族或族裔”这样的字眼，不断强调种族是问题的核心，认为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等都应以种族为着眼点来审视环境正义问题。^⑤

(二)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有关环境正义问题的主要研究都是横向研究，即只研究当前(研究进行时)有毒废弃物设施周边的人口特征，并将之与无此类设施的社区对比，并不关注该设施选址时的社区人口特征，亦不关注自选址后到当前社区人口特征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只能证明当前的环境风险分布中所存在的种族差异性，而在确定这种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

维姬·比恩于1994年在《耶鲁法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少数族裔社区的LULU(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选址歧视还是市场机制》即是此类质疑观点的代表。^⑥论文对影响巨大的美国审计署和基督教联合教会的研究结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前有毒废弃物设施所在地较高的有色人种和穷人的比例或许只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美国的住房市场是一个异常活跃的市场，每年都有17%到20%的美国家庭搬家(1970—1991年的数据显示)。有些家庭搬到了同社区的新家，但许多人会搬到不同的社区，甚至不同的城市。这其中有一部分家庭搬家是因为对原来的社区环境质量不满意。而他们的搬家目的地通常会受到房价和社区环境特点两个因素影响，当然这两个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当一个社区被确定为一个LULU的所在地，则该LULU势必会对此社区造成负面影响。有经济条件搬离的人会选择离开，另外，LULU的存在也会降低该社区的吸引力，从而导致该地区房价下跌，因而吸引更多的低收入人群，结果使整个社区变得更穷。由于美国的少数族裔整体上

①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 *Toxic waste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87, p. xiii, http://d3n8a8pro7vhmx.cloudfront.net/unitedchurchofchrist/legacy_url/13567/toxwrace87.pdf?1418439935.

② Ibid, p. 13.

③ Ibid, p. 11.

④ Ibid, p. 23.

⑤ Ibid, pp. 24-27.

⑥ Vicki Been, “Locally Undesirable Land Uses in Minority Neighborhoods: Disproportionate Siting or Market Dynamics.” *Yale Law Journal*, 103(6), 1994, pp. 1383-1422.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LULU所在的社区就比较容易成为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聚居的地区。

比恩的主要假设便是:无论有毒废弃物设施选址确定时一个社区的人口特征如何,住房市场的流动性或许导致了少数族裔和穷人在有毒废弃物设施宿主社区的聚集。要确认到底是选址过程中的种族歧视,还是选址之后的市场机制,还是两者共同造成了某一个时间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在有毒废弃物设施宿主社区不成比例地集中,需要分析选址时的社区人口特征及选址之后社区人口特征的变化。

比恩回顾了已有研究后指出,所有的研究都不能确定有色及贫困人群和有毒废弃物哪个先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比恩将被称为“环境正义运动之父”的罗伯特·布拉德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作了扩展:首先,分析了这个研究中的有毒废弃物设施在选址时其周边的社区人口特征;其次,追踪了选址之后社区人口特征的变化。

罗伯特·布拉德对休斯顿市25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及焚化炉与黑人社区关系的研究是环境正义运动早期影响较大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后来成为他的《隐形的休斯顿:繁荣与衰败中的黑人经历》及《迪克西的倾倒:种族、阶层和环境质量》这两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布拉德的研究发现:1980年,黑人仅占休斯顿市人口总数的28%,但是该市63%的焚化炉、88%的垃圾填埋场都位于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布拉德的结论是:以休斯顿市为代表的美国南部地区,危险废弃物的焚烧、堆置、填埋以及产生污染的企业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社区。

比恩的扩展研究将布拉德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整,使得追踪有毒废弃物设施所在社区在选址时和选址后的人口特征成为可能。另外,比恩还将研究所使用的社区单位进行调整,使得社区与社区之间更加具有可比性。该扩展研究发现,在7个垃圾填埋场中,有4个所在区域选址时的黑人比例低于整个休斯顿市的黑人比例或与其持平,其他3个所在区域在选址时的黑人比例高于休斯顿市黑人比例。3个小型焚化炉中,1个选址时位于几乎全是白人的社区,其余2个所在社区黑人比例远远高于休斯顿市黑人比例。也就是说,所有废弃物设施中的一半被选在了黑人比例较高的社区。由于当时休斯顿市人口中只有四分之一是黑人,因此废弃物设施中的一半都位于黑人较多社区,这意味着这些设施的选址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差异性。

选址之后废弃物设施所在社区的人口特征变化似乎支持了市场动力理论。从1970年到1980年,所有垃圾填埋场所在社区的黑人人口比例都增加了,增加幅度最高达223%,而同期休斯顿市黑人人口比例只增加了7%。截至1980年,7个垃圾填埋场社区中的4个,3个小型焚化炉社区中的2个,其黑人人口比例都超过了休斯顿市的黑人人口比例。从1980年到1990年,这一趋势得以延续,在总计10个废弃物社区中的9个中,黑人人口比例持续上升,而同时期休斯顿市的黑人人口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对这些社区的经济特点分析展示了相似的变化模式。选址时,7个垃圾填埋场中的2

个,3个焚化炉中的1个,其所在社区的贫困率高于它们各自所在县的贫困率。但是20年后,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7个垃圾填埋场中的5个,3个焚化炉中的2个,其所在社区的贫困率远远高于它们各自所在县的贫困率。

综上,比恩对布拉德的研究进行扩展研究发现,休斯顿市的垃圾填埋场及小型焚化炉的选址存在一定的种族差异性,且市场动力在选址之后的社区人口特征变化中似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推断,一个社区被选为废物处理设施所在地后,其周围的房产价值下降,继而吸引了更多的黑人和低收入群体,该社区也越发贫穷,黑人比例也越来越高。这一发现有力地驳斥了环境种族主义的论断。环境恶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有色人种及低收入群体社区中,并不完全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而是市场和不同人群的经济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单纯的有毒废弃物向有色人种及低收入群体社区聚集,而是有毒废弃物宿主社区以其低廉的地价吸引了经济力量较弱的人群,以及更多的有毒废弃物设施和污染企业,这或许在形成环境恶在特定群体社区不成比例集中的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美国环境正义问题中种族背后的阶层因素

美国主流观点倾向于使用种族的分析框架解释环境正义问题,这或许是由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由于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白人强势,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一直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处于劣势。美国社会各种族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大致分层,种族是美国社会阶级划分的一个简便的方法。通过种族的话语体系,美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缓解贫富分化等阶级差异所引起的社会不满。第二,种族性为人生来所定,并不在个人的掌控之中。罗尔斯认为一个人不应该由于不在自身掌控范围内的原因而失去自由。^①种族正如人的出身、相貌、天赋及运气,是不能任意选择的,因此,基于种族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因此,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研究往往倾向于使用种族政治来分析、解释各种问题,但并未全面探究种族因素背后为何种族不平等会产生并且固化的深层次原因,也就难于形成真正全面有效的解决环境不正义的机制。实际上,环境正义应被纳入广义的社会正义框架之内,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在环境领域的体现。^②相对狭窄的种族分析框架并不利于全面了解并有效应对环境正义问题。

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主体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他们通常是穷人,家庭收入处于社会中线以下,所在的社区贫困率较高。他们通常是工厂工人、农场工人,或者是失业人员。他们不太善于运用法律解决自己遭遇的不平等问题,因此也不太信任法律。他们更依赖自己的生活经历、文化传统来理解自己所经历的不平等。环境问题是他们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贫穷、犯罪、失业长期困扰着他们。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在美国社会真实存在着,他们整体政治力量的不足和经济地位的低下是他们在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的分配中

① 姚大志:《罗尔斯》,长春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② 崔建霞、张一波:《中国环境正义问题成因及破解路径》,《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重要原因。

(一) 环境正义受害群体的政治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期,环境正义运动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随着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入主白宫,美国政府在联邦层面开始正视环境正义问题,国会也收到了几个重要的环境正义法案议案。1993年,众议院议员约翰·刘易斯和参议员艾尔·戈尔联合提交了《环境正义法案》议案,该议案意欲向联邦政府提供数据信息以确认受到最严重环境影响的100个地区,并禁止在该类地区建设更多的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设施。同年,《环境权利平等法案》议案意欲修订《固体废弃物法案》,并禁止在环境重负担地区修建更多的废弃物设施。1993年的另一个议案意欲修订《超级基金法》,要求有毒物与疾病管理局收集有毒废弃物设施周边社区人口的种族、年龄、性别、收入及受教育水平等信息。1994年的《禁止废弃物出入口法案》议案则对美国和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之间的废弃物贸易进行限制。^①

上述所有议案都未能成功立法,这充分说明,环境正义运动的主体政治力量较弱,在国会中缺乏足够的代表。他们更没有相应的资源进行游说,进而影响国会议程。美国是法治国家,各利益群体保护自己权利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法律。美国国会由于拥有立法权一直在美国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立法的成功与否最能体现一个利益群体的政治力量。环境正义运动的主体在美国社会中属于弱势群体,其较弱的政治力量决定了环境正义立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此该阶层遭受过多环境侵害也就无法避免。

由于立法失败,环境正义运动不得不转而依赖克林顿总统发布的12898号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虽然被看做环境正义运动史上的重大进展,但行政命令和法律相比,还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总统行政命令虽体现了当届政府的整体执政风格,却是由总统单独签发的。联邦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由总统任命的,所以,联邦政府的工作重点与谁是总统密切相关。美国宪法规定的4年一次总统大选给联邦政府的工作连续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时期被称为美国的“环保10年”,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环保立法也突飞猛进。但随着80年代里根上台,美国的环保力量遭到了多方面的削弱。90年代克林顿时期,环境正义开始进入联邦政府日程,并逐渐占据重要位置。2000年小布什当选后,环境正义运动又一次遭遇停滞,直到2008年奥巴马执政,才出现了诸如《环境正义计划:2014》《2020:环境正义行动计划》这样极为详尽的路线图式的环境正义实施方案。可见,立法缺失导致环境正义运动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有学者认为,21世纪以来美国的环境正义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美国的少数族

^① Robert Bullard, "Decision Making", in Laura Westra, Bill Lawson (ed.), *Faces of Environmental Racism: Confronting Issues of Global Justi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 10.

裔、低收入群体仍然在不安全、不健康的环境中居住、工作、玩耍、学习。^①

其次,12898号行政命令不是法律,因而没有强制执行力。通常来讲,个人或组织只能基于经国会投票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法律才能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总统行政命令只是用来约束联邦政府各部门(例如联邦环保局)的工作行为与职责的,而且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因其违反了总统行政命令而起诉某个联邦政府部门。12898号行政命令中的第6部分第609条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该行政命令只为优化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内部的管理,并不赋予任何个人或组织任何利益、责任或对政府任何部门、官员或职员提起诉讼的权利。美国政府、各个机构、所有官员及其他所有职员亦不因遵守或未遵守该行政命令而接受任何形式的司法审查”^②。美国的总统行政命令通常都包含类似的语言。因此,争取环境正义的斗争实际上是缺乏有力的法律武器。环境正义工作者们不得不借用《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民权法案》第6条或者《宪法》第14修正案间接地达成环境公平的目标。

然而,《国家环境政策法案》和《民权法案》都不能有效解决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在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分配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前者的主要目标是保护环境,而不是人,后者要求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种族歧视意图。在许多环境不正义案例中,种族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因此,被告往往能轻易地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其他原因,而非种族歧视。总的来说,环境正义运动主体的阶层性质决定他们政治力量较弱,这导致他们在联邦层面的立法诉求往往失败,而缺乏法律武器又反过来更加削弱了该阶层的政治力量。

美国联邦环保局关于“环境正义”的定义分两个部分:公平对待和有效参与。其中有效参与即指:(1)人们应有机会参与有可能对他们的环境或健康造成影响的活动政策的制定;(2)公众的想法应对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3)社区所关心的问题应在决策过程中予以关注;(4)决策者应当寻求潜在受影响者的参与并为其参与提供便利。^③联邦环保局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确保政府决策的公共参与应该是其最基本的职责,但是公共参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凸显了不同阶层的不同参与能力。

通常,公共参与决策的过程都非常冗杂,而有关危险废弃物设施选址的决策由于牵涉到大量环境科学专业术语而更显复杂。因此,公共参与往往只是局限于富裕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群。工厂工人、农场工人的专业能力与时间资源都不利于他们充分参与决策。例如,污染物设施申请和环境评估报告等文件都采取“理性技术”视角,侧重从科学的角度论证某设施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而忽略其对人的健康,尤其是对人的心理、情绪以及由此有可能导致的社区整体价值下滑等影响。大多数受害群体不

① Robert Bullard, Paul Mohai, Robin Saha, et al., “Toxic Wastes and Race at Twenty: Why Race Still Matters After All of These Years”, *Environmental Law*, 38(371), 2008, p. 380.

② William Clinton, *Federal Actions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Minority Populations and Low-income Populations*, 1994,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learn-about-environmental-justice>.

③ 王小文:《美国环境正义探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具备进行专业讨论与论证的能力,而他们所占优势的经验的、感性的、有关社区文化、历史的论据在主流讨论语境中是不被重视的。他们的意见与论据往往被认为是幼稚的、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①

在受影响群体本身不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其看法与建议不受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在参加有关听证会的遭遇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政府官员会在听证会上当场下发一份许可证报告的修订版,这样居民们根本没有时间阅读并准备讨论,他们在发言的时候,政府官员往往心不在焉。另外,听证会召开的地点有时会离受影响社区太远,使得居民们必须租赁大客车。^②而有的听证会上出现的场景是,某些潜在的受影响社区根本就没有人出现,尽管决策部门已经完成了所有确保公众参与的程序。^③

综上,居民的阶层属性决定了他们环境决策公共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而往往受害群体的实际参与程度是不足的,这种参与不足又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这本质上是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不平等分配的阶层因素。

(二) 环境正义受害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除了政治力量之外,决定阶层属性的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上文论述的美国审计署的研究和基督教联合教会的研究在研究种族与环境的关系之外,也都将有毒废弃物宿主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分析并发现,整体来看,有毒废弃物宿主社区的贫困率较高、家庭收入中线低于平均水平、房产价值中数也处于较低水平。但是,这两项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的关系,而一味地强调种族的重要性。实际上,仔细审视有关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的分配机制,不难看到,很多情况下是社会经济地位所定义的阶层起到了主要作用。

里根政府时期是美国环保史上的“环保倒退”时期。为了应对经济滞胀,里根政府采取了削减环保预算、合并环保机构、裁减环保雇员等措施,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CBA)理论。^④该理论认为,环境风险应该放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小的地方,那么不可避免的,在一个10万人口的富裕城市和一个20万人口的贫民区之间,一定是后者中选。富人区虽然人口稀疏,但如果有毒废弃物设施建在富人区,其方圆1英里内的财产价值损失会比放在贫民区其方圆1英里内的财产价值损失高得多,所以根据CBA的分析结果,一大群贫民应该使他们的财产价值减少以避免富人更大程度上的财

① Juliana Maantay, "Zoning law,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what's the connection?",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30(4), 2002, pp. 588-589.

② Luke Cole, Sheila Foster, *From the Ground Up: 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4.

③ Mike Ewall, Esq., "Legal Tools for Environmental Equity vs. Environmental Justi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w & Policy*, 8(1), 2013, pp.4-13.

④ 徐再荣:《里根政府的环境政策变革探析》,《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

产损失。在一个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这似乎很有道理。CBA把平等的价值给予每一个美元,而不是每一个人。在一个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考虑的社会里,政府会不可避免地偏好富人甚于穷人。^①

当然,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的合理性应该受到质疑,因为它导致穷人过多地承受了环境风险,这明显违背了分配正义的原则。让一大群贫民遭受财产损失以避免富人更大程度上的财产损失,这是与现代社会所持有的政府应该平等保护所有公民福利的思想相违背的。另外,成本效益分析明显带有功利主义的倾向,认为为了保护一小群富人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大群穷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总的社会财富的损失达到最小。这也与罗尔斯的“最小受惠者利益最大化”原则相违背。

但是,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的不正当性并不影响该理论被实际应用于政策制定这一事实。美国政府,尤其是在里根时期,在经济发展至上的引导下,取消、延后、减轻了很多环境管制,造成污染物大量增加。遵循相同的逻辑,这些有毒废弃物将不可避免地被堆积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在这里,阶层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

环境不正义不仅表现在有毒废弃物设施分布的种族及阶层差异性上,还表现在生产环节,即工厂工人在工作场所遭遇的环境侵害。

美国的工人运动在进步主义时期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曾在保护工人免受不平等待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20世纪以来,以技术发展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却一步步地弱化了工会及工人的力量,使得“环境敲诈”或者“工作敲诈”成为可能。首先,以流水线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将生产分割为一个个部分,每一个工人只需要负责其中的一部分,虽然每一个部分都是生产产品不可或缺的,但对于工人来说,他能控制的生产要素大大减少了,对自己工作环境中所潜伏的危险也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认知。同时由于机器化生产模式的应用,工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其工作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去技能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替代工人,工人在与雇主的利益斗争中就处于一个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二战之后,大量合成材料、化学制剂和复杂工艺的运用更加弱化了工人对自己的工作环境风险的认识,在防范工作环境风险、主张赔偿等方面处于绝对劣势。90年代以来,生产过程的进一步自动化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导致的外包业务使得工人时时面临失业的危险,在与资方的谈判中越发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进而对工人及周边居民造成严重环境侵害的工厂常常会散发“严厉的环保规范会迫使工厂关门”的论调,以此瓦解工人、工会及环保组织之间的联盟。此外,工人权利保障组织的工作成效之一是制定更为严格的、对工人更为有利的工作场所致癌物质的规范,但是这往往会导致工厂在雇佣工人的时候,不雇佣,或试图解雇由于家族病史、与致癌物

^① 彼得·温茨:《现代环境伦理》,宋玉波、朱丹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7-78页。

质已经接触一定时间等原因而罹患癌症风险增加的工人。工人由于担心失业而就工作环境一再妥协,这便构成环境或工作敲诈。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环保主义者和环境正义活动家已经经常在工作中遭遇低收入群体的敌视,抱怨他们导致了工厂关门或者迁往别处。不断减少的付费会员以及不断加大的来自资方的谈判压力持续腐蚀着劳工与环境组织之间的合作,终于迫使联合汽车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劳工组织在1997年共同抵制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①

环境敲诈是利用工人阶级的弱势地位将环境风险强加于他们的行为,其背后的理论可以被表述为自由市场理论或经济补偿理论。自由市场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从事高环境风险工作的人和接受有毒废弃物设施的社区获得的经济收益如果高于其有可能遭受的损失,那么这些人或社区就更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这就无所谓不正义。自由市场交易被认为能够公平地分配收益与责任。自由市场理论在环境问题中的应用明显是违背正义原则的,因为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人的健康,而人的健康权及生命权当属人的基本自由体系范畴。如果政府任由市场来分配这些基本权利,那么势必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最终弱者会不可避免地失去自由。

环境正义受害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其较弱的政治力量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得政府和企业为有毒废弃物设施的选址发展出了一套“最小抵抗路径”模型。1984年,加利福尼亚废弃物管理委员会委托一家咨询公司洛杉矶赛罗协会进行一项研究,试图找出可行的废弃物焚化炉选址方法。这项研究的结果是一份题为“废物能源转化企业选址所面临的政治困难”的报告,俗称“赛罗报告”。报告明确认定此类设施选址应该遵循最小公众抵抗原则,承认70年代以来有害设施的选址过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工程技术因素。公司和企业应该选择小的农村社区,其居民最好较老,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以下,天主教徒居多,就业于农业、矿业和伐木业等资源抽取型行业。总的来说,该报告建议政府或公司选择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②这一标准几乎全面地描述了环境正义受害群体的阶层特征。

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是弱势群体反对环境权益与环境负担不合理分配的社会政治运动。政府、学术界、宗教团体等通过一系列的实证调查研究,认为种族是决定美国环境权益与负担分配的主要因素。笔者通过对已有的主要调查研究的审视,发现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它们将种族与有毒废弃物设施之间的相关性与因果关系混淆,有可能片面强调了种族因素在决定有毒废弃物设施分布过程中的重要性。另

① Josiah Rect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at Work: The UAW, the War on Cancer, and the Right to Equal Protection from Toxic Hazards in Postwar Americ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tember 2014, p. 500.

② Luke Cole, Sheila Foster, *From the Ground Up: 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the Rise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1.

外,这些研究作为横向研究,只关注某一个时间点有毒废弃物设施所在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而不考虑有毒废弃物设施选址后所在社区的人口特征变化,这无疑会漏掉决定有毒废弃物设施选址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除了种族属性,环境正义问题受害群体的阶层属性,即他们较弱的政治力量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以及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美国社会,决定了他们在环境权益和环境负担分配中处于从属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层面的环境正义立法屡屡失败,充分说明受害群体政治力量薄弱,在国会中没有足够的代表,继而在争取平等环境权益的斗争中缺乏必要的法律工具。他们整体上较低的政治参与能力也使得他们在政府的环境决策过程中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另外,环境正义问题受害群体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使他们在环境和工作、健康和金钱的两难选择中难以有效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种族差异性作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往往被用来分析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突破单一的族群政治的分析框架,探究种族背后更为根本性的阶层问题。

(责任编辑 古东)

Where Does Pollution Go?

——Race and Clas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demands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burden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religious groups and academia have conducted considerable studi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oxic and hazardous waste among social groups. A widely accepted theory specifies race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burdens, and environmental discrimination as an aspect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However, upon close analyses of those studies, a disjunction has been found between the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with a possible overemphasis on race in the explan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sues.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race at its core is widely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policy making, and by the victims in their legal proceedings, but with limited success. Yet, in a way, it proves that race is at any rate not the only factor leading to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Social classes featured by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lso exert a great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America. The weak political power of victim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representative deficiency in the U.S. Congress explain the failur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legislation in congress. Besides, the group lacks 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and are unwilling to be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gress, and their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es also put them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fights against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Key words: American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environmental racism; environmental classism; toxic and hazardous waste;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environmental burden